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吴于廑文选

■ 吴于廑 著

根澂業茂 廑亦聲滋
山高水長 流風長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吴于廑文选

武汉大学出版社

再版说明

在对《吴于廑文选》一书进行再版加工时,我们只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校改,有些方面,如译名、注释的体例及一些特定的表述方式等,都一仍其旧,以尽可能地尊重这类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之原貌。特此说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9月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自序

十年前，《晋阳学刊》来信征稿，约我写一自传。自传给写了，但写时的心情很踌躇。一生已入晚年，想做的事忽忽无成，少可记述。写下来的也是设想多而实绩少，总有一种难以弥补的不足之憾。十年后的今天，看来工作比十年前微有进展，但设想多于实绩的状况，依然无多改变。行年 80，共事诸君很想借此为我出一论文选集。议论未定，而此事已为齐世荣教授闻知，不唯力予赞助，并建议文由自选，选定即列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论著自选集丛书”之一。盛谊可感，值我病余康复良好，乃不复踌躇，欣然从旧作及旧稿中着手自选，共得长短文 30 篇。除论西方史学部分的后四篇系近期据旧讲稿整理成文及最后一篇序文外，其余都曾在各学报和杂志上发表。不论已刊未刊，选定后皆经订正修改，有的酌予增删，有的题目略作文字更易，还有一两篇局部改写。每日工作时间遵医嘱定限，蜗行寸进，未尝逾度，积三月始毕其事。

选定各篇大体可别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计 4 篇，讨论的问题或为对世界史的看法，亦即世界史观；或为对编著和研究世界史的意见，即如何突破自国外引进的世界史著述的成规，从世界全局着眼，在体系方面显示时代特色。第二部分亦计 4 篇，试图说明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大历史运动，自远古以迄 19 世纪。第三部分计七篇，论述西方几大史家或学派的史学思想，属古代的仅希腊修昔底德一人，余皆近代或当代。第四部分计 8 篇，或为专题论文，或为就题抒发所见。第五部分计 7 篇，或为书评，或为序言。每一部分的目录编次，皆以各篇写作年月为序。

附带为几篇文章的选收作点说明。先谈第四部分中论希腊城邦、希腊化文化、古代埃及和巴比伦文化三篇。我对古代埃及、巴比伦、希腊的历史素无研究，而且严格地说，也无在这几方面作专题研究的条件。之所以有机会着笔写这几篇文章，说来有点出于偶然。解放后不久，各大学历史系按教学计划须开设世界古代史课。武大一时无人担任，我乃勉承其乏。这本是应急措施，但由此也就引出一些与此有关的为适应教学之需的约稿，这三篇便是那些年的应约之作。教学方面的偶然承乏，写作方面的偶然有约，给我以较多的接触古代世界历史问题的机会。这对我自60年代初迄80年代逐渐形成从全局考察世界历史的想法，不知不觉中受到惠益。这次重读旧文，从这三篇中似还可以看出这一想法在略见端倪时的点滴痕迹。回思往昔，不忍割舍。因亦收入此集，志我学习世界历史的起步而已。

其次，谈一下两篇早年之作。一为评述孔翰士论民族主义，1945年载《思想与时代月刊》，武汉大学图书馆入藏，一索即得。抗日战争期间，书刊的纸张和印刷都很艰难，复制本字迹几已不可辨识。重录校订之后，决定选用。文中对孔翰士的某些论点，颇称道其警辟有独见。但对其全书主旨，即以西方民族主义发端于法国革命以及民族主义起于民权运动之说，则持有异议。另一为论我国历史上的师保政治与学术教育，1948年载《世纪评论》。武大无馆藏，但无意中却从多年前的一个旧纸袋里发现原稿。复阅后略加删补清整，也决定选收。文中有关知识的看法，青年时期怀之长久，而且不止一次见诸文字言谈。留学美国期间，曾应约作过一次演讲，题为“重求知的人与重德行的人”，讲的内容就是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对知识态度的不同。年少之作大都散失，寻捡不易。留此两篇，不只是为了怀旧，也是为了从几十年前的旧作之中，追寻一下有无后来形成的一些想法的来历。评孔翰士论民族主义一文的末尾，还讲到要写一篇关于西方民族主义史学的文章，与当时一二知名学者辩难。时过境迁，这篇想写的文章久已流为空话。这次重读此文，觉得当年写下的这两句话，隐约有点锐气，也可说是有欠沉

着之气，几次拟删而复留。也许人到老时，有怀未竟，这才感到那点少年锐气，是不无可留的了。

是为序。

1992年12月7日

于武昌珞珈山麓

目 录

一

- 时代和世界历史 (3)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
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 (13)
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 (24)
世界历史 (40)
——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

二

- 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69)
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 (87)
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 (119)
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
世界冲击下的反应 (149)

三

- 巴拉克劳夫的史学观点与欧洲历史末世感 (181)
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 (200)
吉本的历史批判与理性主义思潮 (214)
——重读《罗马帝国衰亡史》第 15、16 章书

伏尔泰史学杂议两题.....	(230)
朗克史学与客观主义.....	(245)
朗克史学一文后论.....	(270)
形态学派三家说略.....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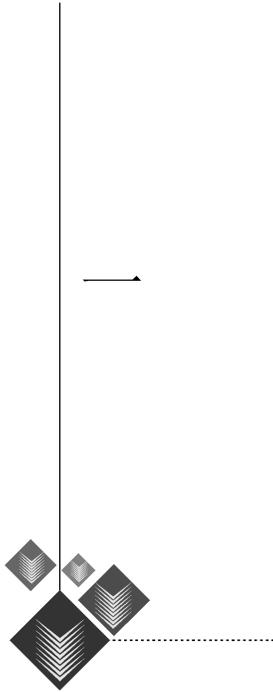
四

师保政治与教育学术.....	(299)
从中世纪前期西欧的法律和君权说到日耳曼 马克公社的残存.....	(307)
关于封建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几个问题.....	(332)
希腊城邦的形成及其历史特点.....	(359)
东西历史汇合下的希腊化文化.....	(372)
埃及和巴比伦古代文化的世界历史意义.....	(383)
西方人本主义非医治中国封建痼疾的灵药.....	(393)
从世界历史看中日文化交流两千年.....	(397)
——纪念“七·七”事变50周年	

五

孔翰士近著《民族主义概念》述评.....	(411)
引远室之光，照古老史学之殿堂.....	(420)
——《欧洲近代史学史》读后	
《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	(427)
《大学世界历史地图》前言.....	(432)
一份是非杂糅的遗产.....	(438)
——《宗教改革与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序	
于见同中说异.....	(441)
——《日本封建社会自治城市研究》序	
乡村工业是孕育近代西方工业化的孢子.....	(443)
——《乡村工业与西欧近代化》序	

自传	(447)
主要著作目录	(459)





时代和世界历史

——试论不同时代关于世界历史中心的不同观点

一

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无疑必须体现世界的观点。所谓世界观点，是针对地区或种族的观点而言的。它应当排除地区或种族观点的偏见，全面而如实地考察世界各地、各国家、民族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一部完好的、真正用世界观点写成的世界史，似乎还不曾出现。

自古以来，可以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世界史家。世界史的概念，如果不苛求这个概念的涵义，并非从近现代才有的。远在人们还不知道世界有多大、多广以前，就已经有过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的史家。希腊后期的波里比阿，著《历史》40卷。他把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看做是为“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①记载时代的巨变而作的；因之不言而喻，它是一部世界的历史。和波里比阿先后同时而又互不相知的司马迁，也曾以写天下的历史自命。他说当他写作《史记》的时候，心里就怀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②的抱负。可见波里比阿和司马迁，都非以一地一国自限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世界史家。在史学史上，像他们这样不知道实际世界有多大、多广而又想为世界写历史的人，可说历代都有。

① 《波里比阿》，I 1。

② 司马迁：《报任安书》。

不用说，古代的所谓世界史家，有各式各样的局限，首先是地理知识的局限。他们所说的天下或世界，是他们时代所知的天下或世界，实际往往不出地球上的一个局部地区。波里比阿的世界，等于地中海的周围。超出这个范围就不甚了了，对世界的绝大部分更完全无知。司马迁的天下，几乎是秦汉之际中国疆域的同义语，从最广的范围说，也不过把《大宛列传》中所谓西域以及东边的朝鲜包括在内而已。这种地理知识上的局限，一切 15、16 世纪以前的所谓世界史家，都程度不同地不能避免。他们当然还有文献方面的局限：例如希罗多德写到了埃及和巴比伦，却没有看到埋藏在地下的埃及和巴比伦的文献；司马迁写到了咸海东南，却不知道希腊人有关大夏的记载。但是所有这些局限都不是根本性的；而且对于古代的史家，我们也不应要求他们知道时代所不知的世界，利用时代所无法利用的文献。他们最大、最根本的局限，在于缺乏一个世界史家所必须具有的世界观点。

对于 15、16 世纪以前的世界史家，所谓世界自然是指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然而即使对于各自时代的已知世界，那些以天下或世界历史自任的古代史学家，也说不上有超越地区或种族的世界观点。司马迁的天下，是存在着夷夏之辨的天下。这个天下是汉人的舞台，汉统治阶级的舞台。仅仅是在这个舞台的边缘，才为汉朝国境以外的某些民族或国家，留下若有若无的咫尺之地。从司马迁的观点说，域外的某些民族或国家，不过是汉天子服属怀柔的对象。他们是“蛮夷”，理当沐受华夏的教化。所以司马迁说：“汉既通使大夏，而西极远蛮，引领内乡……”^①“内乡”两个字，充分说明一种以上国自居，以天下中央自居的思想，这同时就是汉朝统治阶级用以对待文化比较落后的外族的思想。

以这样的观点来对待时代已知的世界，不是司马迁一人所特有的。号为西方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一书，涉及希腊人已知世界的许多民族和国家，评论家无不盛称其眼界之广。但是，正如司马迁的天下有夷夏之辨，希罗多德的世界也存在着希腊人和蛮人

^① 《史记·太史公自序》。

之辨。这在他书中的第一节就已经明说了。可能是因为西亚和埃及都是古代文明的中心，而希腊又的确从它们学到许多有益的东西，这才使希罗多德笔下留情，没有说西亚和埃及的“蛮人”，也有“引领内乡”之意。但是希罗多德绝不因此就对希腊人和“蛮人”而无所轩轻。他书中的最大主题，就是扬希腊人的声威，渲染“蛮人”中最强大的波斯人的败北，特别是歌颂了雅典。书中除记载游历的部分而外，几乎都是为这一主题服务的。所以不管人们怎样称道希罗多德的历史胸襟，他用雅典奴隶主的眼光来观察当时的世界，是无可掩饰的。波里比阿也是如此。他写了公元前3世纪中叶至2世纪中叶地中海的周围世界，以浩瀚的篇幅论证了一个主题，即罗马统治这个世界是合理的和不可避免的。为了这个主题，所有关于迦太基、埃及、希腊、叙利亚等的叙述，都不过是烘云托月。他把罗马的侵入亚洲，看做是有统治之才的罗马人对于亚洲人的赐福，是把亚洲从蛮族的暴行中解救出来，是斯多噶式宇宙理性的体现。这也就是说，“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理当是一个树立罗马秩序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边缘上的蛮族，只是一些不知礼法的顽民而已。波里比阿是丧失了自身独立而依附于罗马统治阶级的希腊贵族代表人。他的观点正是这个阶级的观点。

中古时期的伊斯兰史家和基督教史家又用另一种准则来为世界划界线。他们相信世界是由真主或上帝创造的。真主或上帝是世界的元始，世界应当是信奉真主或上帝的世界。不奉教的世界是邪恶的，它或者不应当存在，或虽存在也只是被蔑视的。因此这些史家不断为各自的奉教世界写下宏篇巨制，对不奉教的世界却视若无睹，或者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9~10世纪的阿拉伯史家塔巴里，写了一部被称为世界历史的多卷本《年代记》。这部书上自真主创世开始，下迄回历纪元302年，即公元915年，内容详博，但叙述范围却不出伊斯兰教传播和征服势力所及的世界。这种畛域分明的世界史，到14世纪伊本·赫勒敦时基本上没有改变。赫勒敦一直被目为伊斯兰史学史上最杰出的世界史家，他的历史哲学也是从全人类立说的。但在他的世界的周围，依旧森然竖立着伊斯兰的界

石。所不同于塔巴里者，赫勒敦的世界中心已经西移，反映自巴格达残破以后，埃及和北非在伊斯兰世界中变得日益重要而已。赫勒敦固然也叙述了某些非阿拉伯民族和国家，但这是因为其中有的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如西班牙和柏柏尔；有的是曾经闯入伊斯兰圣土的十字军首恶，如法国。在伊斯兰世界史中叙述这些民族和国家，仍然是题内应有的文章，并不因此就可证明作者已经打破了歧视异教、异族的偏见。

中古的欧洲基督教史学和伊斯兰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奥格斯丁起，到7世纪的伊息杜尔，一连串号为博学的教父，早就遵照神学的要求，为历史上的世界划定了疆域。这个世界据说从上帝勤劳了6天创造出万物之时就开始了，诞生耶稣的希伯来人的国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早、最圣洁的土地。后来福音传入了罗马，把这座撒旦之城逐渐变为教皇化育万民的中心，于是世界的疆域西移，大部分的欧洲都囊括在内。自此而往，中古欧洲的所谓世界历史，也就是沐受基督教神恩的以欧洲为主的历史。12世纪日耳曼著名史家弗莱辛的奥托，是编写这种世界史的一个典型代表。在奥托这类史家的世界历史体系里，非基督教国家和文明几乎完全被蔑视。亚述、巴比伦都已遭受了天谴。古典的希腊是崇拜多神的各种邪说的渊藪。罗马如果不是因为圣保罗和圣彼得在那里传道殉道，大概也会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一笔勾销。对于伊斯兰的文明，正如伊斯兰史家正眼不瞧基督教的文明一样，欧洲中古的基督教史家也避之若浼。弗莱辛的奥托就曾把当时伊斯兰文明中心的开罗比作一个新的巴比伦。大家知道，按照基督教的术语，巴比伦绝非美名，而是魔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

由上可见，为世界、为天下写历史而又不从世界、不从天下全面着眼，在古代中国史学、古代希腊罗马史学、中古阿拉伯史学和中古欧洲史学中，都是习见的、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例外的现象。如果这仅仅是由于地理或文献知识的局限，那是不足为异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指望古人写他们茫无所知的东西。但是问题的性质还不仅仅是如此。古代史家著述中的世界，往往比他们所知的世界狭窄得多。他们

写哪里，不写哪里，多写哪里，少写哪里，以及怎样写法，都不是简单地决定于知或不知，而更多地是决定于他们的主观标准。对于已知的世界，他们从来不是作为一个世界来看待的，而世界在当时也的确还没有成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他们把世界看得有尊有卑，有主有从，有邪有正，有我与非我。他们对本来就很狭窄的已知世界，看一半不看一半；或者善为青白眼，同于我者视之如宗亲，异于我者视之如仇虏。有的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看做是文明的传布者或统治秩序的创立者，以上国的神色对待周围的“蛮族”。有的把自己的宗教看做是最圣洁的信仰，以护道者的眼光蔑视一切异教。因此，即使以他们所知的世界为准，他们那些为世界、为天下著作的史书，也不能说具有世界的观点。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这样或那样的中心论者，都跳不出地区或种族之类的局限：波里比阿是罗马中心论者，司马迁是汉中心论者，塔巴里是伊斯兰中心论者，弗莱辛的奥托是比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出现得更早的欧洲中心论者。古代和中古史学中之所以产生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论，不完全是因为知识不足，其主要根源是在于居于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的观点。它们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下大国统治阶级君临一切的意识反映。

所以关于世界历史的这种或那种中心论，不是直到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才出现的。自从最早的剥削阶级史家写下了所谓世界历史，就有了这种或那种的中心论。

二

15、16世纪，东西方航海家的活动，为人们扩大了世界地理知识。人们的天地大为宽阔了，每一个现代的学童都能从地图上把世界看得一目了然。随着世界各地接触的加繁，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文献也多已辗转重译。18世纪以后，许多前代所不知的文物、遗迹，纷纷发现，其研究成果也大都公诸于世。所以像古人在著作世界史时所遇到的那些地理和文献知识上的局限，到近现代已不复存在。近现代的世界史家和古人相比，在这些方面的条件不知优越了多少。但是能够